

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

丁文江

這是在燕京和協和講演的題目。當時並沒有稿子。以後在報紙發表的是聽講人的紀錄，當然與我所講的不能完全相符。我現在追憶兩次講演合併寫出來，登在本刊。

在今天國家危急的時候，青年的責任是什麼？青年應該做什麼？這種問題不但青年要問，就是我們已經不是青年的人也常常要問。但是沒有答覆這問題以前，我們先要知道我們工作的效能，因為抗日救國不是單憑情感所能收效的。不管效能如何，盲目的工作，不是負責任的辦法。

今天中國對日本的關係完全是變態的，通常國際的關係不是和就是戰。我們的領土被日本佔領了一年多了；上海的戰爭，我們死去好幾萬人，損失萬萬元以上；現在山海關又被日本佔領了，而我們既然沒有宣戰，又沒有議和！於是許多人提議出兵收復失地，與日本斷絕國交。他們雖沒有明言對日宣戰，但是如果我們實行這種主張，宣戰當然是免不了的。對日宣戰，能够發生效能罷？我們政治上的情形和官兵的訓練，我暫且不提。單就物質上講，

我們沒有宣戰的可能。中國號稱養兵二百萬——日本的常備兵不過二十萬——中國的人口比日本要多四五倍；以人數論，當然我們是佔優勢的。但是我們的一師人往往步槍都不齊全，步槍的口徑也不一律。全國所有的機關槍大概不過幾千桿——歐戰的時候作戰的軍隊每一師有一千五百桿。七五公厘的野戰大概一萬人不到兩尊——實際上需要二十四尊。重戰，坦克，毒氣和飛機可算等於沒有。所以以武器而論，我們的二百萬兵，抵不上日本的十萬。歐戰和上海的經驗告訴我們，近代的戰爭是最殘酷的，是不限于戰鬥員的。海上和空間完全在日本武力支配之下。沿江沿海的砲台都是四十年以前的建築，絲毫沒有防止日本海軍的能力——吳淞的砲台不到五分鐘就毀于日本砲火之下。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的時候，江北的軍隊受日本海軍的監視，不能過江。最後上官雲相的一師夜裏用小船偷渡，因為擁擠，船翻掉好多隻，淹死了好幾百人，而過江耽擱久了，瀏河沒有防禦，日本人就在那裏上岸，抄襲十九路軍的後路。上海事變一發生，南京政府就不能不運到蔞陽。

凡日本的海軍和空軍力量所達到的地方當然完全是日本的領土之肉。所以我們對日宣戰，完全是等于自殺。

作戰不但是要兵器，而且要錢。中央的收入，最好的時候不過六萬萬多萬。其中一半以上是內外債的抵押品。九一八以前，中央所能自由運用的款項每月不到三千萬。

上海的事件一發生，中央可以支配的收入一落就落到二百萬！當時凡有靠中央接濟的機關立時等于停頓。軍隊的餉項也就沒有着落。所以一旦正式宣戰，日本佔領上海，封鎖我們江海海岸，中央的財政立刻即要破產。

以上的事實原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提出出兵收復失地的人，或者是另有作用，或者是爲情感支配，不免自己來欺騙自己。

我們既然不能對日宣戰，我們只好抵制日貨了。抵制日貨是應該做的，是可以做的，因爲至少我們要使得我們的敵人知道他們侵略中國會發生惡影響的，是要受相當的損失的。可惜我們去年抵制日貨的成績太可憐了！去年中日貿易進出口一共是五萬萬圓（五〇〇，四九七，〇〇〇圓）。其中由中國輸出到日本的是二〇六，四四二，〇〇〇圓，由日本輸入到中國的是二九四，〇五五，〇〇〇圓。兩者相抵，我們的對日的入超是八千七百萬圓！這是

連東三省的貿易計算在內。東三省去年的對日貿易進口是一三四，八三二，〇〇〇圓，出口是一〇二，七一九，〇〇〇圓。所以入超是二千二百多萬圓。若是把東三省除外，我們依然有五千五百萬圓的對日入超。這是有兩種原因：一是因爲日圓落價，所以日貨特別的便宜，二是因爲日本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的關稅，所以我們的輸出減少。但是單中國本部，對日貿易總數仍然有二六二，九四六，〇〇〇圓之多，足見去年抵貨的成績是不可問的了。

去年的成績不好，今年不妨從新努力的。但是從上面的數目字我們又得到一個很大的教訓。日本全國的對外貿易共約爲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所以中國本部的對日貿易（東三省除外，香港在內）還不到日本對外貿易總數的百分之十。縱然我們的抵制日貨政策絕對的成功，中日的貿易完全消滅，日本的對外貿易仍然有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之多。由此看起來，雖然抵制日貨可以使日本受相當的損失，然而決不能制日本的死命，決不能使日本交還我們的失地。何況不用政府的力量來裁制，中日貿易絕對的不能消滅——就是多量的減少也不很容易。而且中日貿易原不是單于日本有利。果真消滅，中國也要受很大的犧牲呢？

所以目前要出兵收復失地，不但不能成功而且還要有更大的損失；抵制日貨最大的效能，是使日本減少對外貿易百分之十。真正要收復失地，非中國能戰勝日本不可。如何能使中國有戰勝日本的力量，是全國人民的責任，尤其是現在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的責任。因為這決不是幾年以內所能做到的。如果中國有這一天，一定是現在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努力奮鬥的結果。

我所謂抗日，不是單指收復失地而言的。目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收復我們已失去的東三省，是保全我們將失去失的熱河和平津。在九一八事件發生的時候，大多數的日本人不過希望維持「南滿」的權利。因為佔領遼寧和吉林太容易了，於是擴張到錦州以西，長春以北。假如日本又輕輕易易的佔領了熱河，日本軍閥一定要向長城以南打主意。華北如果不保，中南兩部又豈能偏安？如此則中國全部的滅亡不過是時間問題，要使日本軍閥不能實行他們的計畫，唯一的辦法是使日本受最大的犧牲纔能佔領熱河，使他們的軍閥知道中華民國的土地是不容易讓與人家的，是要用金錢和性命來交換的。這兩件東西日本都不是不甚愛惜的。若是我們咬緊牙關抱定了不賤賣主義，他或者出不起這樣大的價錢，放棄他們一部分的野心。這是我們目

前唯一生路。

為保存熱河華北，目前固然要積極抵抗，但是這種抵抗，決不是短時期可以了結的。縱然日本不攻熱河，我們當然還要收復東三省。縱然熱河又喪失了，我們還要保全華北。所以抗日的工作，不是憑一時的熱心可以了事的，是要有長期的繼續工作，使中國真能自衛，真能戰勝日本，纔可以發生真正的效能。

認清了這個目的，然後我們再開青年的責任是什麼？青年應該做甚麼？

這個問題也只有在變態的國家纔會得發生的。假如中國的國家和歐美一樣，全國的青年早已接到了動員令，拿着槍，攬着包，「執干戈以衛社稷」去了。那裏還容你演說，捐款，貼標語，喊口號，視察前線，慰勞傷兵呢？因為這些輕鬆的工作，都是不能拿槍作戰的人所能做的，輪不著青年的。做這種工作，決不足以盡青年的責任的。如果有大學學生要逃難逃攻，縱然不被槍斃，至少也被學校革除，家族不容，社會不齒。

如此說來，我豈不是勸青年去當義勇軍嗎？這却又不然。義勇軍的作用與抵制日貨一樣，是應該做的，是可以做的，是能使日本受相當損失的，但是不能制日本的致命

的。已失的土地不是單靠義勇軍所能收復的，將失未失的省分不是單靠義勇軍所能保存的。凡有青年懷他的良心，爲國家去犧牲，我對於他們萬分的感謝，萬分的敬仰，但是我決不動告青年去當義勇軍。第一我對於目前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是否有當義勇軍的資格，不免有幾分的懷疑。前幾天我看見報上發表了幾位燕京學生從熱河的來信。他們敘述從北平坐汽車到熱河的經驗，似乎已經覺得很是苦痛。有幾位受不了震搖，已經嘔吐了。如果當了義勇軍，吃不飽，穿不暖，睡不足，在冰天雪地之下，做日本人飛機重敵的目標，他們是否受得了，實在也是問題。就是義勇軍——或者尤其是義勇軍——不能不講紀律的。紀律最重要的原則是要能服從命令。在學校裏以主人自居慣了的學生，不肯聽校長教員命令的學生，是否肯聽義勇軍連排長的命令。也許我這種懷疑是過分的。歐戰的時候，許多大學的學生，每天非洗滌換衣服不可的學生，在戰壕裡喂了好幾年的虱子。足見得吃苦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只要有軍令的強迫或是愛國的眞忱。但是目前中國的需要和歐戰時完全不同。歐戰的時候（尤其在不用徵兵制的英國）所最需要的是「人力」Man Power。中國現在並不是如此。在熱河和東三省能當義勇軍，肯當義勇軍的人至少在十萬以

上。目前的問題，不是缺少人，是缺少錢，缺少槍，缺少子彈，缺少服裝，尤其是缺少能指揮和組織的人材。現在一個受大學教育的學生去當義勇軍，縱然他能吃苦，肯服從，學會了打槍騎馬，是否比一個字不識的義勇軍高明，還是疑問，而他從小學到大學，十幾年的工夫已經糜費了國家社會好幾千的金錢。從社會國家看起來，這是極不經濟的一種辦法。不錯，這種自動的犧牲精神，是足以感動人心，激發士氣的，所以我已經說過了。我對於他們只有感謝，只有敬仰，但是這只可聽極少數的人憑自己的良心情感去做的，不必也不可勸告的。就是在歐洲大戰的時候，作戰的國家也未始不打造種算盤，所以凡有有專門技能的人，都設法使他們做專門的工作，不一定強迫他們到壕溝裏去。

凡是不能或是不肯當義勇軍的學生，當然不妨做些後方的工作。捐款也好，慰勞前線也好，救護傷兵也好。這些事我並不反對。但是我要請他們覺悟，這都是太太小姐們所能做的工作，不算什麼希奇。不能發生多大的效能的。這不過在無法之中，做自己良心上的安慰，就譬如我們幾個人辦獨立評論一樣。決不能因此要求學校裏放假，停課，或是免考，正如我們不能因爲辦獨立評論，要求學校

不叫我們救書。

我說後方的工作不能發生多大的效能。這句話也許要加以說明。工作最切實的莫如捐款。但是我們仔細想想，我們的困難真正是因為沒有錢嗎？我們每年的軍費在三萬萬元以上，佔中央收入百分之五十。這十年來日本的軍費還不如我們的多。只有一九二一年他們的軍事預算到過三萬萬五千萬元。何以我們不能和他抵抗？再進一步說，人人都知道我們養兵太多，而沒有餘錢來供給武器。假如明天我們能够把兵額減少了一半，省下錢來去購買或是製造新式的武器，我們就能抵抗日本嗎？甲午中日開戰的時候我們海軍的噸數船隻都在日本之上。何以海戰我們弄得一敗塗地？足見得單有武器，沒有能運用武器的人，還是不行的。現在軍官真有運用新式武器的能力與否，實在還是疑問。因為目前的高等軍事教育比任何高等教育還要落後。三十年前所通行的翻譯教授制度，只有軍事教育仍舊的沿用。這就是落後的鐵証。在這種狀況之下，私人的捐款最大的效能，只能使前線作戰的兵士知道後方的國民沒有忘記他們，或者可以振作他們的敵愾心，增加他們的抵抗力。但是我已經說過，這種工作，太太小姐們多能做。多肯做的，實際上用不着青年，輪不到青年。至少青年

不能以捐款為他們不讀書的口實。

還有許多工作大可以不必做的。即如所謂軍事訓練。在目前的狀況之下在大學裏面臨時添設這種功課，效果是很有限的。學生所可以學的，不過是普通的步兵操法。這種技能除了去當兵之外，沒有用處。不願或是不願當兵的人來受這種訓練，不但是白費時間，而且帶幾分欺人的性質。願意當兵的儘可向前敵去投效。國家養一個大學學生，一年平均要用一千元，學生私人的費用還不在內。一個兵士一年只要用一百多元。余辦大學的費用來養成當兵的人材，那是多們不經濟。縱然說有少數人要以爲當義勇軍的預備，要求學校幫忙，學校當局應該要求他們立下志願書，在短期時間之內，一定去做義勇軍，不去則願意受相當的懲罰。如此纔能够免去虛偽欺人的毛病，增加社會上對於學生的信用。

第二種不必做的工作就是所謂抗日的宣傳。這種工作日本人天天在那裏替我們做着。許多中年的人做起來比學生要有力量。況且宣傳的目的無非是要引起國人的愛國心。我認爲這並不是我們的缺點。中國人自古以來都是知道愛國的。要不然金元清三朝の入寇倒不會過着那樣長期的抵抗了。但是若是單有了愛國心，國家就不會得滅亡，那

麼，金元清也不會得成功了。許多學生以爲愛國心是進過學校的人所獨有的東西。要向民衆去宣傳。這是很大的錯誤。上海事變的時候，送給十九路軍的絲綿背心都是不肯要錢的裁縫做的。當老媽子丫頭的人，拿首飾出來捐款的，我所知道的就不止一個。前天我在交民巷走路。看見有

幾個日本兵僱洋車，一排七輛放着，只有一個車夫理會他們，而開口就要四毛錢。結果日本兵只好走路。中國的不識字的民衆何嘗不知道愛國呢？不但民衆如此，軍閥又何嘗不是如此。吳佩孚的不肯住租界，段祺瑞的離開天津，都是他們愛國的証據。我所見過的軍人，如馮玉祥，閻錫山，蔣介石，張學良，孫傳芳，李宗仁，白崇禧，黃紹雄，我相信都是愛國的。可惜他們雖然愛國，他們沒有法子使愛國心發生效能！中國上上下下都是低能的國民，都不知道新式的國家應該如何組織，如何統治。其中有許多人受的教育太粗淺了，人格上沒有經過相當的陶鎔和修養，利慾當前的時候，免不了要受誘惑。這是我們今天不能抵抗日本的根本原因。

今天青年的責任是什麼？青年應該做什麼？他們應該要十二分的努力，徹底的了解近代國家的需要，養成成功近代國民的人格和態度，學會了最低限度的專門技能，然後

可以使他們的一點愛國心，成功結晶品，發生出有效能的行爲。抵抗日本，收復失地，一定要到中國能有戰勝日本力量的那一天，纔會得成爲事實。要中國能有那一天，一定要徹底改造一個新式的中國。做這種改造新國家的預備工作，是今天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唯一的責任！

這是積極的。消極的講起來，至少青年不可做子抗日有妨礙的舉動。逃難，避考，向影戲園寫恐嚇信，溜水場拋炸彈，都是例子。中國的鐵路都是單軌的，都是缺少車輛的。軍政當局根本不知道運輸應該有事先的計畫。一旦運起兵來，火車立刻就要誤點。逃難的人一多，火車的運輸更形擁擠，鐵路的秩序更沒有法子可以維持。一月初旬東西車站的紊亂，都是逃難避考的學生所演出來的。這不但增加了政府許多困難，而且損失了國民許多信用。普通人對於學生的舉動向來是原諒的。到了這一次，社會上的質難漸漸的深刻。北平已經有人提議把北方大學的經費改充軍餉。聽說南方也有人向政府提出同樣的建議。這種計畫如果實行，中華民國的前途更沒有希望，因為要建設新式的國家，必須要有受過新式教育的人材。大學如果停辦，新人材的來源就斷絕了。那不是等于自殺嗎？但是要得這種提議不能實現，青年要尊重自己的人格，恢復社會

的信用。要不然他們就是國家最大的罪人！

看影戲溜冰都不能認為是不正當的娛樂。溜冰尤其是維持健康最好的運動。中國的士大夫階級，有一部分向來是反對運動，反對娛樂的。所以我們在私塾讀書的時候，一步不准出書房，終年沒有假期。不料到了今天，受高等教育的青年，還有這種錯誤的思想，以為娛樂和運動是與救國不相容的。試問要做救國工作的人，就不要維持他的心理上身體上的康健了麼？終日「楚囚相對」，貼慷慨激昂的標語，喊痛哭流涕的口號，一定要弄出神經病來。抗日的工作又豈是神經衰弱的人所能担任的？日俄戰爭的時候，我在日本。我沒有看日本政府對於娛樂場有絲毫的限制。歐戰的時候也沒有任何的國家禁止青年運動。我不是要獎勵青年在國難期中作為無益。凡真正作為無益的人——只知道看電影溜冰的人——無論在任何社會都是廢物，于國

難的有無，沒有關係。況且如果我們認為某種娛樂是于抗日有妨礙的，我們只可以要求政府正式禁止，或是提倡一種風氣，用社會的力量來裁制，萬萬不可用恐嚇的手段，來擾亂秩序。拋一個炸彈，並不能使電影院關門，尤其不能使看電影的人，省下錢來，捐給義勇軍，徒然增加市民的恐慌，損失政府的威信。我們只要看見北平娛樂場發現炸彈的第二天，米麵雜糧一齊加價，就知道這種舉動是誤國不淺的了。

抗日救國，不是幾天的事，並且不是幾年的事，是要有長期的決心和努力，纔能够有成效的。在目前的中國，四十歲以上人很少有建設新中國的能力；我們的唯一的希望，是在目前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我相信逃考逃難，以貼標語喊口號自欺欺人的學生是少數的，是一時的，所以我把這兩次的演說合併寫了出來，獻給他們。

中國大學生的成績與缺點

詠霓

中國目前的苦境完全是前一輩人所造成。中國將來的前途當然要靠現在青年的努力。以前的國事還有許多甚至于大部份操之于不由學校出身的人，以後的重要事情差不

多全靠大學畢業生去担任。現在已經是大學畢業生負責的時代。所以大學生的程度和能力關係是重大的，試看他們不能担当他們的責任，至少是在一種職業中自盡其

資。

從好的方面看，民國以來大學生的能力實已頗有進步。就我所知道的例如北京大學中央大學（連前東南大學在內）及清華大學的理科學生，北洋大學交通大學（包括上海與唐山）的工科學生，即使未曾出洋留學，也頗有人能在他們的專門工作中有實在的貢獻，和良好的成績。近年來的中國地質學工作，至少從量的方面看（在地質學中量的關係亦甚重要）中國學者所做的已大過于外國學者，而中國學者中本國畢業的所做又超過于留學回國的。在中國礦業中本國畢業生也很有極好的成績；此外各科學中本國畢業生都有相當成功，證明中國大學教育並不完全白費。對於大學教育失望的人一概抹殺未免有些冤枉。民國十七年北京大學開三十週年的紀念會時，葛利普教授曾有一個講演，歷數北大學生在古生物學上的發見和貢獻，引為北大的光榮。我想各校同學會以及其他學校團體，很可以仿此辦法，不時統計一下他們同學在專門職業上或學業上的貢獻與成績，這定是很有激勵意義的，也可以增加社會的信仰。同學之中如能有一點學問或事業上的建樹，他所給予母校的光榮，當然大過于產生了幾位造孽作惡的大官。

大學教育的目的在養成好的有能力的學生。如果出來的學生是有用的，其他方面即使有些不甚滿意的地方，當然儘可逐步改良，用不著一筆抹殺絕對灰心。

中國事情往往是這樣，某種事情起先大家希望太高，以為只怕不辦，一辦起來便有飛快的天大的好處。等到剛有些辦起來了，當然好處還不甚顯著，而初辦的事缺點不能盡免，於是就有人向著缺點盡力攻擊，把事業整個推翻。其結果是事事失其信用，人人覺得灰心。所以我們常聽見說教育救國，科學救國，過了幾天便又喊教育亡國。科學雖還沒有人說他亡國，但剛剛有些發軔，便已很有人說科學無用。這正和政治制度一樣，試了這個又試那個，一忽兒又回到這個，輾轉反覆而民不堪命國不可救矣。無論什麼事總要用真知去分別好壞，有毅力去逐步推行，尤其是要從中國千餘年的八股腦筋去接受現代文化，更要有許多耐心用許多苦工。

以上已是題外之言。我說中國大學學生很產生了許多有用之材，但我也不是說他們毫無缺點，就我所感覺的可分為幾點說明。

第一是缺乏普通的常識。說起來也許有人不肯相信。我常感覺許多大學畢業生，只要有人領導，叫他們做窄小

的專門工作還甚容易。而要他們自己去解決比較普通問題，却往往甚難。偶讀國聯教育考查團對於中國教育的報告書，其中也有這樣的話：

……教育機關之人員，有時遇著比較普通之問題，雖利用所有一切材料，尙難由已知之事實中求出結論。……彼等對於普通問題，甚至對於現成材料，均無充分之知識。……

因爲人生在世遇著的實際問題甚是繁多，決不是全靠教科書內的現成方式一一可以解決。教育所給予我們的好處，第一是養成思考能力，只要有相當材料，便能自己得到真實的結論，或是遇見一定的問題，自己能够找出解決的途徑。如果缺乏這種普通能力，而只學到一些專門技術的成法，則那個人只能在專門事業上有他的局部的貢獻，（當然亦甚重要）而對於社會事情的見解及判斷，一定不能正確，叫他担任普通的事物或是專門事業中比較綜括的職務，他反不能勝任。萬一他的專門技術又不甚高，或雖好而偶而不得其用，他便成了無用之人。而且如果社會上有許多見解不清判斷不明的人，社會的進步便會受他們的壞影響。並因此養成盲從的輿論，影響到國家政治。

第二是缺乏應用的精神。大多數中國學生的心理似乎

常想有什麼用，才去求什麼學。而不常想有了學問，便極力去用。他們常探聽什麼學有用，什麼學無用。所謂有用者，便是容易找事，謀生活的意思。這本是人情之常，未可厚非。可惜的是除了生活問題之外，便缺乏用其所學的志趣。譬如一個學化學的，如果沒有機會做一個化學試驗所的研究員，而做了一個普通機關的職員，不但他的學問不會上進，而且很短的時間會把他整個的拋棄了。儘有空閒的時間，他寧使去打麻雀。不但不想法自己去做一些工作，即使有現成的化學書報，近便的化學講演，也懶得去看去聽。其實無論何國社會上究竟能吃專門飯的人少，做普通的事多。但做普通事的人生活之外並不禁止他對於某種特別事情上多用一點心。例如西洋人在中國傳教或做外交官的往往成了漢學專家，或對於某種研究有了特別知識。所以不肯應用，不能應用，也是中國許多自以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實各種事業都靠試驗與磨鍊出來。所以努力去幹，雖學問本非甚深，後來也能成功。不肯應用，雖功課成績甚好，亦是徒然。近來上海很有幾家工廠，都是由化學程度並非甚高的人，極力試驗成功的。這便是應用精神的表現。而現在大學生這種精神似乎不多。

第三是缺乏開創的能力。中國雖是一個古國，但在現代世界中我們應該開創的事業正是甚多。開創一種新事業

像開墾一片新田地一樣，必須要有一種 *Motors* 的能力與精神。不能專吃現成飯，隨着他人走。現在大學學生在校時常是探聽人家學的多的科目，跟着去學。出校後專向人家已做的事業搶着去做。至于許多尚未發達的科目，或尚未開創的事業，反往往無人過問。結果是一方面人浮于事，一方面是有事無人。我以為大學教育的目的最要緊的是要養成學生對於事業上幹功立業的志趣。再給他實現此志趣的能力。有太多的人，除生活以外無他志，或是誤解人生觀，只圖目前的享樂。青年人應該信仰「事在人為」，

「有志者事竟成，」奮勇的把有益的事業担在自己肩上，做一分是一分，得一步進一步。

大學畢業有了專門學問的人，能够得到一個專門機關，有專家的指導，有專門的設備，從事研究有所貢獻，這固然極好。但一國之內也用不着太多的調查所或研究所，即使調查研究的結果，也希望有人能拿去實用。

要試驗大學生的真正能力，最好的方法是放他在地廣人稀的西北地方，看他能組織起什麼事業來。也可以放他在黑暗混沌的衙門內，（現在還有的是）看他能不能有正確的見解，與做事的效率。

今日中國的兩線希望

尹及

今日在中國與明末的中國，真可謂無獨有偶！明末時流寇橫行，今日則共產黨猖獗（雖說則匪勝利了，但這「勝利」能支持幾時？據會視察克復後匪區的某君談，他說「這次總算官兵打贏了！」，其意在言外了！）。明末天災人禍一齊來，今日的水災旱災和兵燹大禍也一齊有。當明末李自成打到北京時，崇禎皇帝向諸大臣籌款抵抗，

諸大臣相顧愕然，不拔一毛，崇禎遂廢然與歎，他說「君非亡國之君，民非亡國之民，而臣皆亡國之臣」。今日中國的「臣」，「何莫非如是？國難到如此地步，尚有陳學木李國杰這種的「臣」！尚有「相顧愕然」望風逃避的士大夫（指學生們）！明末時人心呈整個瓦解的像，今日中國的人心也是真正的土崩瓦解。明末時亡國的恐怖來自

東北，今日亡國的恐怖也是來自東北！現在這個恐怖已「遺關」了！我們眼巴巴看着亡國的大禍就在目前了！

但是我們眼巴巴的看着今日的中國與明末將亡的中國一樣，有甚麼地方可以想法兒來保留這個祖國呢？那是看現在的中國與明末的中國到底有甚麼重要的分別？和有甚麼有希望的共同點。

我想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分別，就是在明末時無所謂「國際均衡」，而在今日則有所謂Balance of Power

明末時的生死爭鬪，是那時的中國人與那時的滿洲人的爭鬥，無第三者的干與，彷彿兩個獸物在籠裏相持，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縱有第三者加入戰團，這第三者也是想收漁人之利，想把兩造一齊吞下去，如元朝把金人及宋人一齊征服一樣。那時候並無一種「大家都活着，大家都均衝着，大家都看着大家」的思想。所以明人與滿人相持，誰打败了誰誰作奴隸。

但是現在的世界不同了。任何兩國打仗，總有無數的其他國家瞧着，預備着，留意着打仗的結果是否破壞十七世紀以來國際關係的最大原則——就是「國際均衡」。所以甲午之戰，俄德法英等都瞧着，預備着。等到馬關條約把遼東半島給了日本，俄德法就馬上起來干涉，強迫日本

把牠交還中國。當然，俄國是無疑的有自吞遼東半島的野心，但是讓日本一人吞下這塊肥肉，畢竟有損於「國際均衡」。所以俄國租到旅順大連，英國就馬上要租威海衛，法國就馬上要租廣州灣，也無非是要保持這個原則。

也許歐戰後這個「國際均衡」的原則，有些改變，但是仍大體一樣。試看法國今日在歐洲的種種政治活動，無非是保持歐洲大陸的均勢。為保持這均勢起見，法國不惜利用與「國際均衡」原則相背的國際聯盟。基於「國際合作」的國際聯盟，竟被自私的法國拿來作維持國際均衡的工具！可見得今日究竟是一個國際均衡的世界，還未到一個國際合作的樂土。

這個「國際均衡」原則會引起很多次戰爭，但也會保持過相當的和平。試看中國收回山東就可知了。歐戰時青島及膠濟鐵路和山東省的一重要部份都落於日本人之手。老實說起來，那時日本佔了山東比現在佔了東三省還要危險，因為佔了山東便是扼住中國的咽喉，那時國都在北京，日本在濟南擋住津浦路的通車，就可沿黃河岸把中國截而為二。況日本在山東南去也行，北去也行，所走的都是寬坦的平原和快速的火車，要征服中國，山東真是最好沒有的大本營。更糟的就是英法諸國居然在一九一九

年把日本人佔領山東予以法律的及條約的承認！

但是在 一九二二年我們居然把山東拿回來了。我們能够把這塊緊要地方拿回來，難道是因為我們那時長強了嗎？難道是因為我們打了一次勝仗嗎？難道那時的中國是統一了嗎？一九二二年的中國比一九一九年的中國，不但是沒有變好而實在是每況愈下。一九一九年不過是南北兩政府對峙的時候；一九二二年接着直皖戰爭便來了奉直戰爭，那時正是軍閥混戰的時候，中國最少有三個政府。政治上那時的中國既是分崩離析，而在思想上，在社會行為上，在道德信條上也正是新舊派衝突時期，離統一的局面更遠。以較好的一九一九年的中國加上五四運動猶不能阻止巴黎和會把山東送給日本，而較壞的一九二二年的中國——分崩離析的中國——居然不勞一兵一矢把偌大的山東收回來。我們試捫心自問，我們那時憑甚麼收如此的功效？兵力嗎？中國兵打不過日本。好政府嗎？北京內閣朝立而夕倒。財力嗎？連馬上贖回膠濟路的錢都沒有。

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那時的成功，不是憑我們自己的力量，而是憑外來的力量。這種力量便是國際均衡的壓力。日本佔領山東與太平洋上國際均衡的原則不合，所以英

法美——尤其是美國和英國太平洋上的屬地——非要日本把山東（二十一條凡爾賽條約都給了牠的山東）放棄不可。這與俄德法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相像，日本雖蠻橫，然凜於已變成政治舉動的世界公論之不可蔑視，也居然乖乖地聽服了。

今日日本之佔據東三省，其違背國際均衡之原則，與佔據山東正復相同，列強早晚總要取某種政治舉動的。但是現在都不動，那是因為列強自身內部問題太多了：失業問題，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和歐戰後賠款戰債的種種負擔，都是使列強個個都觀望着。但是我相信列強決不能白白讓日本單動的吞併東三省，因為如此則遼東的國際均勢不能保持。

除非列強馬上要共管中國（照現在情形看，馬上共管是不容易實現的），列強的利益終究在維持中國的政治獨立，不是因為他們有甚麼厚愛於中國，而是因為惟有這樣才能維持遼東的國際均衡。所謂門戶開放主義者，就是保持遼東國際均衡的意思。所以由政治獨立之立場看，國際均衡原則是對於中國有利的，而中國欲維持政治獨立，亦止有運用國際均衡之一法。中國罪孽深重，懦弱無能已到極點，純粹憑自己的力量自救危亡，恐怕是廢話。古人

有言：「孟賁之勇不能自舉其身」，何況中國現在尙無孟賁之勇」乎？救中國的危亡，非有外力不可，而這種外力——國際均衡——一定要由我們自己運用。

運用國際均衡的外來力量，不能算是羞辱。自有外交以來，那一國不是運用此力量來保持自己的國土？自己力量不夠，當然是要利用外力，這是不消說。加富爾看薩典利亞的力量不夠敵奧，不得不求助於法國。美國十三州看自己力量不夠單獨抗英，又不得不與法國訂盟。求外力不算是羞辱，視乎自己能否運用，看自己能否作主。如果我們能自己作主，那麼運用國際均衡的力量，也許是中國保持政治獨立的一線希望罷？

中國外交受陳語瀾調的禍真不少！李鴻章時，還用「遠交近攻」——「以夷制夷」的話標榜於世，到了近幾年，連甚麼交都不講了，要打倒一切強國，鬧到四面楚歌到處仇敵的困境。無事時則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以打倒帝國主義者，拯救弱小民族爲己任；有事時則哀號乞憐，但是所乞憐的都是已得罪過的了。原來外交上有一基本原则，就是

「一時只能够有一個敵人」，(You can afford to have

only one enemy at a time) ，這個簡單原則，過去的常軸套套諸公，似乎未曾領會，鬧到現在中國連一個得力的

朋友都沒有，自陷於不光榮的孤立。今日的急務是在國際間找朋友。找朋友的道，第一在自己充實力量，第二也要作外交上聯絡，最少可以防止外敵從中破壞充實自己力量的工作，如俄國與鄰邦訂互不侵犯條約，爲的是聯絡左右鄰舍，使自己建設工作不至於破壞。

俄國近來的外交值得我們效法。你看牠絕不「遠交近攻」，近的軀交，連兇橫的日本牠都忍耐到底。遠的如美國牠能交則交，不能交也能。反正最能與你搗亂的是你的近鄰，除非你要征服你的近鄰，不然你須與他們和好。如近鄰難於和好，則須認清誰是最大的敵人，然後抱「一時只容許一個敵人」之原則，盡力與其他的和好，和好方法不外知己知人，應其所需。朋友都是費力氣找來的，絕沒有天墜落來給你的，國際間亦何嘗不是？

中國的近鄰，強大的算是俄國和日本，現在與日本和好之路既走不通，當然要與俄國和好。但和俄第一要明瞭俄國情形，第二要想中國能給俄國什麼好處。加富爾作薩典利亞的商務總長時，便提議把對法國入口商品的關稅律減低，以買好法國，復親自去巴黎與拿破崙第三訂交。

後來更不怕議會罵他賣國，居然背割二城 (Savoie and Nice) 給法國。西洋外交家之斤斤欲買好得力的朋友如此

我國的外交家的開口國人帝國主義者又如他，我國的外交怎能收勝利？所以我們要結好俄國——我們敵人的敵人——，一定要我們先給牠點好處，而要知道牠要甚麼，先要考察牠國內情形。中俄復交那天，大公報組織蘇俄考察團的主張，是很對的。

一九二二年美國是太平洋國際均衡的樞紐，現在恐怕要算俄國了。現趁中俄已復交，這個機會不可失。運用國際均衡的支點，也許是俄國，今日的中國與明末的中國，分別也在這裏，看我們能否利用這個機會罷！

今日的中國與明末的中國，有希望的分別已如上述，有希望的共同點是甚麼呢？我以為是這樣：華南是反攻的大本營，是救中國恢復中國的策源地。

清朝征服華北比較快點，征服華南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費了五十年功夫才告成功。反抗清朝的勢力都不是在華北華中的一望無際的平原，而在高山峻嶺的華南——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鄭成功選佔據臺灣，到康熙晚年（一六八二）經過康熙雄謀大略的用兵，才告克定。假如中國今日是給外敵征服，華北必在先，華中次之，華南必最後，將來反攻的勢力，如洪秀全孫中山輩，也許來自兩廣。

我們試想，華北離東三省最近，受外敵的剝削，應最深，抵制仇貨的運動也應該最烈。而實際上不然，抵貨運動，反在離東三省最遠的廣東為最熱烈。近年以來，公共建設事業選算兩廣首屈一指。論起民氣，無論誰都不能否認南方比北方強烈些。頭一個敢與日本人開仗的還是十路軍的南方人，這並不是說北方人不成，北方民氣之所以不振也許有可原諒的理由，但南方民氣的確比北方強烈些，事實具在，無容諱言。

原來南方與北方有一個很重要的分別，就是北方災荒多，而南方災荒少。災荒對於中國人人格的影響，美國有一位學者（Kilsworth Huntington）已詳言之。災荒於中國人自私性格的養成，實在值得注意。中國為一根深蒂固的災荒國家，所以處處都露着互相傾軋排擠的現象，彷彿人人都不能一飽，至於所謂同情心憐憫心更談不到了。災荒多重的地方，此種性格愈為顯著；災荒少的地方，則比較好些。（此點俟異日詳論）

華南受條約的束縛，比華北地方較少些。華北受辛丑條約二十一條等等的束縛，不知吃虧多少。即如這次山海關的陷落，據何柱國說因為辛丑條約都把險要給了敵人，所以華軍無險可守，節節敗退。華南亦未嘗無條約的束縛

，如香港澳門雖橫梗於珠江出口，但都不是致命傷，歷史上亦未曾有過以香港澳門為對華南兩省用兵根據地的事實。以視東三省現已變作日本對華北用兵的根據地，及平津各處都有外國駐兵，那塊地方比較的容易作反攻根據地，就可不言而喻了。

華南比華北富庶，少受經濟上壓迫，運籌策畫，都比較容易下手，這也是事實。國民黨的革命，幾乎完全倚靠廣東的財源，以一省之力，廣東給養革命黨的迭次用兵者，凡三十餘年。除江浙而外，中國沒有一省有如此能力的。這其中廣東的華僑在財力上的接濟當然不算少。

照現在情形看，華南恐怕是中國的又一線希望。這並不是勸諸位避危就安，馬上要到華南去。當此華北危急存亡的時候，在華北有職守的，當然應該忠於職守，不應抱頭鼠竄，回南躲避。在此處一日有職守，即一日應當在此處守候着。但依歷史的觀點看，華北雖亡，華南仍可作反攻的大本營及自救的策源地。

以上是雜亂的感想，無以題之，題之曰「中國的兩線希望」。這裏當然有不對的地方，尚望讀者指教。

二十二年，一，十八。

教育罪言(五)(續)

旭生

至於政府方面，對於教育，一言以蔽之，曰漠視。如果專就迹象上看，十七年以後，教育經費，大體全頗有增加；積欠比從前總算較少。並且國府主席當軍旅稍有一點暇豫的時候，就自己兼任教育部長，藉圖整頓，可謂重視之至，斥為漠視，寧非厚誣。雖然，專就教育經費言，數量大小，關係尚屬第二位，頂重要的，却在其款項的穩定。

，鎮之以定，持之以恒。近數年來，政府對於教育，毫無確定計畫，並且可以說，牠對於教育界裏面的情形，有莫名其妙妙的地方。實在教育經費並不需要怎樣特別的增加，止要遵守先總理的遺訓，對於庚款，不要任便掣用。對於各種學潮，止要不築室道謀，稍持定力，也不需要什麼軍隊的後盾，就可以完全平息。如果這樣辦理數年，雖說教育制度與社會經濟情形完全不合，終非妥善的辦法，焉

還不很難。清華那樣貴族的教育，雖非我們所肅求，而學生總還可以學點東西，不至如前面所說把功課弄清楚的學生止達百分之十的比例。可是政府爲便私圖，將庚款隨便動用，專就現在經費的數目而論，施所少發的實在有限，可是教育界因此而受的損失，已經難以數計。至於蔣介石先生當日之自兼教育總長，適見其他對於教育情形的隔膜。我揣想他的意思，必定說，教育的不良爲社會秩序不安寧的主要動因，比方說，學生思想左傾，動好搗亂之類，所以毅然決然，自兼部長，力圖整頓。他的魄力固然可佩服，可是他的看法却完全錯誤了。教育不良能影響到社會秩序，固然不錯，但這種影響，必須經頗久的時間，才可以看出來。對於這一點，直到現在，教育界自身還沒有很清楚的觀念，蔣先生軍務倥傯，我想他是不会看到這些的結果。至於學生思想左傾，動多搗亂，那全是社會秩序紛亂的結果。止要社會稍有秩序，以中國人之好靜惡動，左傾搗亂，雖不敢說要完全絕迹，絕不能成大患害，殆可斷言。倒果爲因，必至止湯揚沸，究有何益？幸而蔣先生尚頗持重，未敢嚴厲整頓，否則即封閉若干大學，槍斃若干教職員學生，亦不過涸涸而益紛之耳。數年之間，教育毫無

反對，就把強停辦。實在，不管一種制度怎樣好，開始實行的時候，萬不會沒有阻力；不真正實行三年五年以後，也難看出牠利弊之所在；試行一年半載就恢復原狀，即使舊制全非，新制全是，而終不如不改。前日何所見而行大學區制，後日何所見而廢大學區制，袞袞諸公，以及教育當局，均毫無成見也。一事之起，政府漫無成見，多詢之于教育界元老蔡元培李戴諸先生，這本是一種賢明的辦法，可是這些位元老意見也不一致，並且有時候，一位的意見也不見得很堅定；這樣而想教育能有全盤的計畫，豈不甚難？並且我所尤不能明白的，却是吳稚暉老先生的態度。吳先生的道德人格爲我們所敬服的一個人，他的識見也很多超越羣倫的地方。但是他對於教育界中每一次風潮，總是持仍舊貫主義；你要問他的理由，他好像要說這些洋八股學校，反正是辦不好，不如隨牠去。他看準現在的學校所教的是洋八股，我現在異常佩服他觀察力的銳利，因爲我對於這一點，直到近一兩年，才深切的感覺到；雖然說他老先生意中的非洋八股的範圍，同我們意中的非洋八股的範圍，大約還不很相同，可是現在各中學大學裏面所教的東西，差不多全體並不是真正的科學，不過是一種

洋八股，那却是毫無疑問。他老先生觀察力既是這樣的銳利，而又身負教育重望，我想他一定要嘔盡心血，想出些補救的法子。但是一直到現在，却還完全沒有看見，並且好像也沒有去作，那豈不是一件令人難以索解的事情麼？如果說他怕得罪人或怕麻煩，那又不像他老先生的素行。然則在這些地方，也只好疑以傳疑，不敢冒稱解人了。

政府的情形既如彼，教育界元老的意見紛歧並不堅定又如此，並且處到現在複雜萬分的環境裏面，想要教育的發展，真是「憂受乎其難之」。此外如政府內容的不景氣，用人的毫無方針，均足使青年的身心受一種惡劣的影響，因為大家所詳知，不再贅論。

四，教職員的太不負責任。現在教育的惡濁腐敗，雖說古人同現在教育界以外的人們，均不能不負點責任，而最重要一部分的責任，却不能不卸在教職員的肩頭上，那也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其他的一切，對於學生的影響，還不過是間接的，至于教職員的學問品行，却是時時刻刻直接影響到學生的身心上面。可是他們負的責任雖然如此重大，而所以養成這樣腐敗的真正原因，分析起來，却又頗為簡單。第一，他們不肯切實研究學問；第二，他們對於

要推委說，現在學校設備不完善，生活無保障，怎麼樣能責備人來負責任研究和作事呢？他們這些話當然也有一部分的理由。但是如果把各國的思想史，科學史詳細翻閱起來，一定可以看出來當那些大思想家，大科學家作出他們的大發明，大發現的時候，他們所服務的機關設備未見得就怎麼樣的完善，他們的生活未見得就會絕對安定。昨天我聽得孟真先生說：曾經得過納伯爾獎金的物理學家萊克（Leak）先生，他的研究室在一個很卑下的房子裏面，即使晴天而光線亦不充足；外邊又為公衆打靶的地方，終天煩囂。他這樣的實驗室，無論北平任何大學中的實驗室也要比他的高明。但是他竟在那樣的地方作他很重要的發明。北平各大學的設備自然說不到很好，但是像樣能用的也還算有一些；十七年以後，教職員的薪水欠的還不算很多，可是求田問舍的教職員雖說頗有一些，而肯對於他們所教的學科作一種切實研究的人已經是鳳毛麟角，不要說什麼發明與發現了。他們自身就沒有研究的興趣，怎麼樣能指導學生去研究呢？至於學校的無紀律，教職員所負的責任也極重大。我相信：如果一個學校裏面的教職員，全富於研究的興趣，對於學生的訓練肯負全責，那個學校

學生不能負起應有的責任。這類的話教職員們，他們不能

說不能推委風潮，即使偶有風潮，也一定是快他平息。

可是現在的學潮，大部分總有些教職員作背景。真正的原因由于理想不同，意見不同的頗少，差不多全體是由于飯碗的衝突。像這樣學問，這樣品行的教職員，怎麼能談到指導和訓練學生！即使他們能辦的巧妙，安靜無事，也不過誤人子弟更有效率而已，與教育家，思想家，科學家的責任，固絲毫無關係也。

五、學生思想的懶惰。學生對於功課方面的懶惰，大部分應該由教職員負責。但是他們——尤其是大學的學生，已達成人的年齡，具相當的知識，對於來到他們前面的一切事情，就應該用自己的理性審擇一番，得了相當明了的認識，然後負責的夫應付牠們；這才是應該取的態度。可是現在的大學學生，對於一切，大至于國家政治的組織，近至於母校重要的變革，大多數全認為與己無干，漠不關心。學生的團體，除了極少數人所組織的或能照軌則進行外，全體的組織，如學生自治會等類的團體，差不多沒有一校不是由少數人把持的。你要怪他們的把持麼？那却不能這樣簡單的斷定。因為大多數的學生全覺得這會裏面的事情，對於他們毫無利益而袖手不問，管事的止有很少的幾個人。那會的前途止有三條：第一，如果種巧這些管事的人是很熱心的人，那結果就是這些人累得要死，

事情也辦不出來什麼大成績，並且常常受那些說風涼話的人的悶氣；第二，如果這些當選的人是一些平常不熱心的，那會務就要完全停頓；第三，如果這些當選的人是一些好便私圖的，那他們却很可以利用他們那些小小的職務，得著種種的生發。除了第二種情形不必談外，在第三種情形之下，固然是把持，但是在第一種情形之下，又何嘗不是把持？你又怎麼樣能怪他們把持呢？並且，好便私圖的人，何時蔑有？何地蔑有？不滿異邦大多數的民衆看的很清楚，不肯放棄自己的責任，就有少數好便私圖的人，也看得出如果亂七八糟的作，與他們自己毫無所利，所以不能去作，不敢去作。至于我國，就是大多數的大學生，也不清楚社會是應該怎麼樣組織，自己應該負什麼樣的責任，而竟一味旁觀。你要問他們為什麼不肯問事，他如果是很誠實的，一定告訴你說，這些事情對於他沒有什麼益處。然則他們的無理事，同好便私圖的人是一樣的，也是自私自利的。所不同的，就是他們的自私自利是消極的，至于好便私圖的人却是積極的。天下事總是積極者戰勝消極者，然則在中國，好便私圖的人，很容易達到目的，又有什麼可奇怪呢？所以中國事，括總說起，少數的作惡為患猶小，大多數的昏惰為患甚大。大學生因為自己所處的學校大

就很自命不凡，然而他們的昏惰，並不亞于他界，這真是有志之士所極感棘手的事。他們大多數沒有開事的習慣，並且可以說沒有用理性去思想的習慣，所以偶爾開事，他們思想的淺薄極可憐憫。我現在隨便舉一個例子：國難以來，各報的讀者論壇，我倒常常翻閱。這些文字大約為各大學的學生所寫。主戰之聲震然于耳，但是怎麼樣戰，戰的近果若何，遠果若何，大體變化若何，這些問題，却不常有人想到。我個人自從國難以來，是前後一致的堅決主戰派，但是，我們相信，即使全國動員，堅決抵抗，而一定要敗；敗的結果，沿海大城，除却廣東的，一定要被敵人占領，東北的大平原也早晚要被敵人占領；這些結果，現在主戰的青年，恐怕未見得全想到吧。沿海大城失後，餉源無著，繼續抵抗，我們相信是可能的，但是很艱苦的；這些鉅大的困難，恐怕今日主戰的青年差不多全沒有大想到吧。東北大平原失後，想要繼續抵抗，一定需要地方的民衆團結起來，連絡起來，同敵人作連續不斷的游擊戰，然後才能找出最後的出路；這也是一件萬不可易的事。但是作游擊戰，在山間易，在平地難。我們應該想出什麼一樣新辦法才能戰勝這種困難。在平原作游擊戰，需要馬匹甚多，而我國馬政不修，馬匹不敷用，戰勝這種

困難，雖說不見得無法，而方法却是必須我們嘔盡心血來想。像這一類的問題，多至不可勝數，我疑惑今日主戰的青年，恐怕全沒有想到吧。即使持久以後，戰可以勝，而傷必異常的鉅，痛必異常的深，全國優良的青年恐怕要有一多半的傷亡，這樣的結果，恐怕今日主戰的青年未見得有人想到吧。這一切重要的問題完全沒有想到，而冒然主戰，自欺欺人，又何怪山海關炮聲一響，大多數的平津大學生趕緊向後轉，回家走呢？我們辦教育十餘年，止養出些思想如此昏惰的學生，真足令人痛哭也！

要而言之，現在教育腐敗的責任，古人要負百分之三十上下；環境，或可以說教育界以外的人們要負百分之二十；教職員要負百分之三十以上；學生自身也不能不負百分之七十上的責任。而在教職員中，負責任尤重者，為所稱之教育專家。

六、教育專家的尸位素餐。我這樣的譴責教育專家，大家不要疑惑我又來附和孟真先生，同在美國學過教育的諸位先生們為難，也不要疑惑留法學生想希圖留美學生的飯碗。實在我個人雖然沒有學過教育，更不配稱什麼教育專家，但是我在大學教書十餘年，辦理教育行政也有五年，我毫無意思逃脫我個人應負的責任。實在情形，

去是我國興學四十餘年，而教育上很基本的一件事情，並不難看出的一件事情，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把牠弄清楚。教育是一種社會事業，萬不能離社會經濟而獨立，實在是天經地義，萬不容磨滅的一件真理。中國的社會經濟情形同歐美各強國及日本有極大的差異，是無論何人全可以看得到的。可是中國的教育制度，不是抄襲日本，就是抄襲英美德各國的。他們這些國家全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剝削的壓榨的國家，我國却是同他們相反，是被剝削的，被壓榨的國家。人家是大富豪，我們是窮光蛋。一個家徒四壁的貧人，想教育子弟，却抄襲人家大富豪的辦法，無論說學不像，就使能亦步亦趨，究竟能有什麼用處？我現在深相信梁漱溟先生的話，我們所抄襲的教育制度，止可名為都市教育制度，可是我國全體是無限農村所集合的，非另外創造一種農村教育制度，我國的教育前途是無希望的。——我沒有讀梁先生書以前，這個意思我也已經有了，不過都市教育，農村教育兩詞，却是沿用梁先生的對於這樣一個基本問題，我的聞見很鄙陋，好想很多的教育專家，並未會嚴重考慮過似的。止有舒新城先生前年曾到我家，談到這個問題，有深切的認識。蔣先生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我直到現在還沒有拜讀過。對這個問題認識頂清楚，知道現行制度根本要不得的，據我所見，大約止有梁漱溟先生。可惜到現在，我還沒有看見他對於鄉村教育所提

出具體的方案。在外國學教育的人，好比在外國得到一套新式建築，就想原封把牠搬到中國來住。他在這個時候，至少應該有兩步萬不可少的工作：第一，是現下的地面是否可以放得穩，如果放不甚穩，必須要有些平基補牆一類的工作；第二，是應該看看這樣的建築與中國的氣候相合否，與衛生有益否，如果不相合，必須用理性斟酌新舊，創造出來一種與中國的氣候相合的新建築。第一種工作在那建築裏面，者就可以作。至于第二種工作，那却非跳到建築外面，精密考察研究，沒有辦法。我國的教育專家，好像因在他們那一套的建築裏面，永遠沒有能跳出外面，看看與環境適合不適合的機會。他們所能作的，至多是第一步工作。至于第二步，雖不敢說他們永遠沒有想到，但是意識是含混的，好像除了這一套或其他相類的一套，萬不能有什麼新的一套，所以他們也沒有感覺到跳到外面看看的必要與可能。我個人不敢冒充教育專家，但是總願意也跳到外面看一看。至于所想出的新辦法對不對，那却希望大家破除成見，精細的來討論。

現在教育腐敗的原因，據我所分析到的，大約如上所述。並且我們相信，現在教育界及教育界以外的人們，固然要負一大部分的責任，可是制度自身也有極大的缺陷。不設法改革，而想挽救已經頹壞的學風是不可能的。至于我們所擬的改革的方案，且聽下回分解。

商 務 印 書 館

復 業 紀 念

大

廉 價

一八國難。瞬屆一週。敝館總廠雖經莫大之犧牲。但絕不敢因此稍懷自餒。全國教育界及讀書界。亦以敝館對於文化事業關係重大。督促早日恢復。爰於二十一年八月一日勉力復業。為文化而奮鬥。數月以來。備承海內外人士熱心維護。紛紛惠顧。實深感幸。惟當時各級學校教科用書。雖在北平香港兩分廠趕印齊全。而一般出品。不免稍有缺漏。敝館至為疚心。現在上海已新設製版印刷兩廠。平版廠亦即日開工。生產力量。逐漸充足。不特被燬各書。次第重版。並自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起。每日出版新書一種。其他各項文具儀器。均已補充。供求可以相應。茲為紀念復業。並酬答海內外人士維護熱心起見。特自二十二年一月起。至三月底止。舉行廉價。藉表徵忱。謹將廉價辦法列后。諸希 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廉 價 辦 法

- (一) 中小學教科書及教科補充用書。一律照原售價再打八折。(另印甲乙兩種書目為憑)
- (二) 一般用書。原版西書。文具儀器。等。(由總分館各自酌提若干種)分次發售特價。隨時公布。
- (一) 雜誌(不論預定或零購)。一律九折。
- (一) 廉價概以門市或通訊購買為限。
- (二) 廉價售出之貨。概不退換。
- (一) 廉價期限。上海發行所自民國二十二年一月起。至三月底止。(外埠通訊購買以郵局日期戳

為憑)各地分館。自行酌定。